



审慎,乃是司法的要则

游伟

我们的社会正处在变革转型的关键期,全面深化改革和强化社会治理,需要突破传统的思维习惯,创新工作机制与方法。而在这一方面,法学界则更关注法律对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正向作用,关心司法如何对不法经济行为进行有效规制,同时又能够充分保障市场的应有活力,维护好市场主体的正当权益。

需要特别引起重视的是,在一个社会的治理体系中,通常可以有经济、行政、法律、道德等多种调整手段和治理方式,法律措施仅仅是其中的一种方式,尤其是

刑事处罚手段,虽说颇为“给力”、“痛快”,但其“长治久安”效果却十分有限。

事实上,法学界在对待剥夺人身自由乃至生命权利的刑事手段时,长久以来都抱着非常审慎的态度,强调拘留、逮捕等刑事强制措施的使用和刑罚的运用,需要采取“谦抑”的立场,只有在作为“最后手段”时,方可动用。尤其是对待经济领域中的越轨行为,司法也应当更为谨慎。

法学专家认为,刑事措施的适用和司法的介入,必须顾及各种复杂的社会状况,要分析某些不法经济行

为的成因及社会变迁中制度、机制滞后的因素,不能把转型社会存在的某些制度、机制上的固有弊端和责任,全部推向企业或者个人。

不少不法经济行为对社会的危害,都具有潜在和间接的特点。由于交织着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因素,甚至案件的“受害人”本身都存在失误乃至过错,因此,某些经济行为通常不容易形成像杀人、抢劫、强奸等恶性罪案那样的“公愤”。有些经济违规乃至犯罪的“新形态”,甚至正是改革不到位、不深入、不彻底的“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不可能通过重刑去予以

遏制,更难以用死刑去加以灭绝,唯有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完善制度等“社会改革”的方式才能获得解决。这也正是某些重大案件的司法裁决与民众感受出现较大反差的一个缘由。

某些不法经济行为的成因,往往也比传统的危害公共安全、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要复杂很多。原因日趋多元、综合,也使得不法经济行为中的个体责任有明显的减弱。虽然,我们至今都不能以现实社会中心此类行为的成因复杂去排除行为个人的责任,但在具体案件的处理中,又不能不考虑那些来自社会制度、管理体

制、分配方式、经济政策之类的因素。毕竟,在综合上述因素后所形成的处罚裁决,才更符合司法审慎的要则。

不少法学者的实证研究已表明,惩罚轻重与不法经济行为发生率的高低之间,原本就不存在绝对的反比关系。这或许正是造成长期以来司法上“加大打击力度”,但某些涉罪经济案件依然时有出现,甚至长期被认为“打击不力”的原因。

在这样的状态下,如果不迅速改变社会治理的传统方式和司法对策,不加速推进社会体系、金融体制及相关资料资源配置、公平竞争的体

制、机制和环境建设,依旧寄希望于通过一味加重惩罚、司法“严打”的方法,去控制经济领域中的违法乃至犯罪行为的滋生、蔓延,恐怕会非常不切实际。

改革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最终都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去解决。治标虽不可少,但却只能管控一时和一事。唯有坚持“审慎”司法的原则,合理、适度地制裁不法经济行为,并积极引导、加快体制转型和机制改革,才能减少和消除经济领域中的恶性竞争,建立市场主体及交易活动的诚实信用,实现标本兼治、长远之治。

“总理套餐”为什么风靡

凌河



这一周的起始,便有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海口的“总理套餐”,仅仅一个月,就卖出了整整100万套。什么叫“总理套餐”呢?原来是4月11日,李克强总理走进海口市坡博路的“宜之佳”便利店,从腰包掏出钱来,买了春光牌的一盒椰子脆片和一盒椰奶酥卷,花了19元。于是“总理套餐”风靡一时,最初两个礼拜,每天热卖2万套,商家又于4月底推出系列“套餐”,每天竟可卖掉6万套。现在19元的“总理套餐”已经推向全国,“今年有望销售一亿元”,厂里日夜加工,产量翻了三倍,“还只能满足订单的七成”……

这当然令人不免要想起更早些时候的“庆丰包子”来——习主席到北京最大众化的庆丰连锁店,与老百姓挤在一起,吃了二两包子和一份炒肝,于是“庆丰包子”立马风靡天下。且不说京城那家包子铺,早已人满为患、长龙排队,便是千里之外的某省两会,也以“庆丰包子”代替了先前的十菜一汤,只是包子的个儿,谦恭地比北京城的“庆丰”小了一圈。“庆丰包子”风靡到后来,竟还惹出官司,遍地英雄的“庆丰包子”,令北京的“正宗”再也不能坐视,连发声明说你们都是“李鬼”,连炒肝都是冒牌!总之烽火四起,总之差一点要动手,无非是为了一只包子。

其实这样的事儿并不只是一只“庆丰包子”和一份“总理套餐”——春节过后,习总书记不是在钓鱼台的养源斋设宴款待连战伉俪么?因为同是陕西乡亲,所以桌面上放的是羊肉泡馍、肉夹馍以及“biangbiang面”。谁料第二天,陕西那边,便有数家餐馆,推出了“习连套餐”,依样画葫芦,也是这三样,售价均为58元,据说也是热销了一阵呢!

至于美国副总统钻进北京的小胡同,点了几个小菜,不是立马就有了“拜登套餐”吗?也是那几个菜,也是那一听可乐,也是78元人民币,真还风行了半年呢!

关于这个“套餐”问题,舆论之间是有叹息的,无非是两条,一是我们的国人,太缺乏创意,再来弄去一份“套餐”,为什么总是东施效颦老一套,总是一个固定的模式,就是创不了新出不了奇呢?二是国人的注意力,为什么总是集中在一个“吃”字上面?比如说,习大大与民同吃包子,表率了哪种风格,批评了什么风气,恐怕早已淡定,风起云涌之间,似乎只剩下一只“包子”;又比如说,“习连会”谈些什么,两岸骨肉还会怎样走近,又有多少人关心了呢?似乎那焦点,仅在于一张菜单、一份“套餐”!

这当然令人叹息。但更令人叹息的是,我们的国人,为什么对一份“套餐”、一个“吃”的问题那么热心如此专注?这里头,除了我们多少年来总是吃不饱肚皮因此面对一个“吃”字尤其敏感而外,更在于一个“吃”字,凝聚了国民对于官风、对于某些官场的深深痛心啊!因为“胡吃海喝”,“革命的小酒天天醉”,他们的“套餐”,又岂止十菜一汤,所以人们对于一个“庆丰包子”、一份“习连套餐”,对于习大大的节俭和简朴,是那么地“如沐新风”;又因为“公款吃喝”,从不掏腰包,“工资从来不用”,所以人们对于李总理的“自己掏钱”买吃的,又是那样“喜出望外”!这样看起来,国人对于一份“套餐”的热追捧甚至“反常”的热销,竟有了一点深刻的“现实批判性”,多少表达了人们对于官场“四风”的愤怒和不容——关于这一点,我们的商家已有敏锐的“政治嗅觉”,而我们的官员,是否更应当有痛切的感知,不要再麻木不仁呢?



打酱油

叶开

“打酱油”这个词据说来源很多,本文只取其一:广州电视台记者曾在街头采访一位路人,问其对“艳照门”事件有何看法,被访男子答曰:“关我鸟事,我出来买酱油的。”

这可能是无意的回答,一经播放,迅速走红。很多有心网友用各种方式演绎,甚至还画了“酱油男”的漫画,在网络上传播。一个词语的流行就像病毒一样,在社会上迅速扫过,碰上者无不喷嚏连连。这种表面的语言现象,如深挖下去,一定会发现其下藏着复杂的政治、文化、社会、心理等各种原因。所以,不能把流行词简单地看成是一种戏谑、反讽、幽默的语言游戏,而要看到在冰山之下,潜行着看不见的庞然大物。

处在不断转型中的一个社会,因法律有待健全等各种原因,个人力量和个人声音显得非常微弱,个人权利也可能遭到不知来自何方的暴力侵犯。因此,普通人在面对需要表态的困窘局面时,大多选择退缩、息息的应对策略。

中国有漫长的社会动荡历史,不断的改朝换代,激发了一次又一次的社会大动荡,而生灵涂炭,赤地千里。晚唐诗人曹松在《乙亥岁》中感叹,“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元代词人张养浩在《山坡羊·潼关怀古》云,“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如此多历史教训,无数动乱战争,中国人本应彻底反思而加以避免。却因制度性的原因,或文化的原因,如伟人

云“两千年皆行秦制度”等等,改朝换代频繁却仍是“换汤不换药”。每一个朝代到了晚期,各种尖锐的社会、经济、政治矛盾激化,致民乱蜂起,而大厦倾覆,生灵涂炭。

这种社会大动荡对普通百姓的伤害记忆实在是太深重了,所以中国民间传统一直有各种自保智慧,如“枪打出头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等古训,让普通民众学会取消自我,尤其是在乱世中,更要学会退缩、隐忍而“苟全性命于乱世”。这类文化记忆,不可谓不流传深远。如果法律无法有效地保护个人权利,那么每个人在面对各种社会事件时,都会首先选择自保和退缩,而不愿意冒险介入一个“真相不明”的社会事件之中。

公权力、私意见等各种微妙态度,一旦出现在各种社会事件交汇的中心,一旦无法把控,就可能引发动荡和不安。而普通人就首先会想到要自我保护,要尽量规避明显的个人态度,从而隐退自我,潜入人群,营造心理上和现实中的安全盔甲。

“打酱油”这个词的蔓延,微妙地体现了普通人对公众事件的规避态度。每个人在需要针对社会事件表态时,因为内心的恐惧而选择自我取消,成为“路人甲”和“路人乙”,拎着空空的酱油瓶,沿着现实的边缘,贴地而逝。

要建立一个有效率的社会,需要制度保障、法律保障,需要激发每一位公民对社会事件的参与,贡献智慧,而这一切,都需要我们重新反思“打酱油”的态度是如何出现的,又应该如何应对、解决。



余烬录

李泓冰

有时你真说不清,时间算残忍还是善良。

距离那场大地震狞笑着抹掉那个叫“北川”的县城,从那个曾经青翠而温暖的小城带走一万多条生命,竟然已经六年了。

曾经目睹过它的突然死亡。在那座满目疮痍的死城,听过北川中学死难学生的父母讲述那一夜的心碎。“我儿子读初二,他算幸运的,直接伤在头部,当场就走了,没有受太多的罪!”“我赶到北川中学时,丈夫已经找到左脚被砸在废墟中无法脱身的女儿。女儿一见我就哭了:妈妈救我,我不想死!我抱着女儿,鼓励她一定要坚强,我们说了长达六个小时的悄悄话,可我怀里的女儿,还是渐渐冰凉了……”

也曾经看过复苏的县城和开始崭新生活的北川人。不久前,熟识的一个北川中学幸存女孩嫁为人妻,邀我赴北川参加婚礼。新娘貌美如花,新郎是驻藏航空兵,英俊挺拔。喜宴上,女孩父亲携他即将成婚的女友,端坐着享用两位新人的敬茶。一切都祥和美满。离开婚礼,我去了北川那个仍是一片废墟的老县城,算是替幸福的女孩去告慰在5月12日那一天永远远埋的亲娘……与北川老县城的寂灭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不远处规划得非常现代的北川新县城,生机茁茁,一切都那么鲜亮。

灾难的深创巨痛,就这么翻了篇儿。长大了的“可乐男孩”坐在轮椅上,咧着嘴笑着,除了贤惠的太太,他还拥有两家汽车美容店。一些生命消失了,但生活还在继续。伤痛埋在心里,生机还在蔓延。

是该欣慰不是吗?

翻检着媒体关于地震六周年的零星报道,洋溢着新生的欣喜。感谢国家救援与民间互助的力量,这力度在共和国前所未有的,让灾区浴火重生;也感激六年的时间,成为疗伤的力量,大家都在努力渐渐复元,走出灾难的阴影。只是,当纪念日结束,还是有些不安。灾区经济复苏、社会祥和固然令人欣慰,但就知识界、文艺界、文博界而言,似乎有点过于沉寂。当然,也许记忆的捡拾、作品的酝酿、博物馆的陈设,都还在进行之中。毕竟,还只是短短的六年。

这场大地震中,总计近9万条生命牺牲。灾难的起承转合,应该庄严地进入民族记忆、国家记忆,甚至是全球记忆。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正是在对灾难的惊恐记忆中,一点一滴地反思与创新,才积累起今天如此灿烂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为了北川的新生,为了将来地震中的“北川”不再成为废墟,为了灾难中迸发出的人性光辉成为全民族永远的精神财富,我们不能轻易失忆。

要拒绝失忆,是需要一些现实载体的。比如,影视作品、美术作品能否郑重反映汶川大地震?沉溺于快餐式文字的孩子,是否能在教科书中读到这段记忆,并在教师的引导下沉思片刻?虽然我们已经设立了“5·12防灾减灾日”,但更要让这个特殊的日子有实质性的内容。总之,要让孩子们的思想厚重起来,让防灾减灾的意识强烈起来,让逝去的平民生命高贵起来,让“痛”出来的精神成果沉淀起来……

那位北川新娘,听到我对北川新县城的赞叹时,沉默了一会,说了一句:“确实很漂亮,可能是过于漂亮了,不太像家。”

唉,一下子被这句淡淡的话击中,痛得揪心。